

分析哲学语境中的“我思故我在” ——欣提卡诠释的突破与困境

李曦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雅克·欣提卡在诠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命题时创造了一种新的范式——践言性诠释。在这种诠释中, “我思”被解释为一种与“言语行为”逻辑同构的思想行为, “我思”的功能则被阐释为“我在心灵中对自己说‘我不存在’”, 因而“我在”自身得以确证, “我思”命题成立。欣提卡关于自我是通过他人的目光得以确证这一最具革命性的观点, 后来虽有修正, 但为继续探寻“我思”命题开辟了新的途径。

关键词: 笛卡尔; 雅克·欣提卡; 我思; 我在; 践言性诠释

中图分类号: B712.59; B56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9)05-0587-05

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的魅力, 不仅在于它作为一个时代口号所具有的鼓舞性, 而且在于它的开放性。如果我们将“我思故我在”当成一个问题域, 那么, 从笛卡尔至今, 这个问题域一直在不断地更新, 哲学家在解决一些旧问题的同时, 又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从“我思”到“我在”, 中间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 “我思”的独特性体现在哪里? 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让笛卡尔本人头痛不已, 而且后人也没有办法替笛卡尔自圆其说, “我思故我在”对人类理性的挑战, 吸引着众多哲学家的兴趣。

在当代众多“我思”命题的诠释者中, 有人尝试站在笛卡尔的语境中替笛卡尔辩护, 方法是掌握笛卡尔的全部著作, 将他的各种相关表述融为一体, 使得“我思”命题成立。这种诠释我们称之为原语境诠释法, 代表人物是美国密苏里大学哲学教授彼得·马基(Peter Markie)^[1](140-171)]。有人则是立足于诠释者自身的语境, 以文本的问题域为跳板, 借此提出相关的新问题, 做出新的解答, 并引发新的困境, 使问题域得以拓宽, 思想得以延续。这种诠释我们称之为新语境诠释法, 代表人物是雅克·欣提卡(Jaakko Hintikka, 1929-)^①。

作为世界顶级的逻辑学家和分析哲学家, 欣提卡借鉴了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 在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语境下重新诠释“我思故我在”, 这种诠释方法颇具新意, 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掀起了新一轮的笛卡尔热, 评论者众多。一些坚持正统

诠释的学者认为这种解释离经叛道, 纷纷起来反驳, 而一些坚持新语境诠释法的学者则认为这种诠释颇具启发性, 同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改进方案。2000年, 欣提卡的诠释文章被译为法文, 发表在笛卡尔的故乡——法国的哲学杂志《形而上学与道德评论》(Revue de Metaphysique et de Morale)上, 这更说明了该诠释的影响力之大。下面我们来解读欣提卡的诠释。

一、1962年论文: 践言性诠释的基本框架

1962年, 欣提卡发表了论文“我思故我在: 推理还是践言”^{[2][3]}, 提出了他的“践言性诠释”(Performatory Interpretation)的基本框架。

按照常规的做法, 解读“我思故我在”, 首先是研究“我思”, 然后顺延到“我在”, 不过欣提卡却用了一种逆向思考方式, 首先考察“我在”, 并且将“我在”放到日常生活的语境下。他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情景, 戴高乐亲口说出: “戴高乐不存在。”其他人说这句话, 大家都能理解, 唯独戴高乐本人说出这句话时, 大家无法理解, 因为如果这个陈述句为真, 则意味着说出这个句子的人不存在。这里说话者并没有犯逻辑错误, 而是犯了“存在性矛盾”(existential inconsistency)的错误, 也就是说, 当戴高乐说出“戴高乐不存在”时, 这一言语行为或者践言行为的荒谬性不是源于理论的困

境,而是实践上的不可能性,我们无法将这样的陈述付诸实践,因为这违反了我们日常语言游戏的一个基础性规则:说话者希望听者相信他所说的话。由于听者知道说话者是谁,所以当说话者说“我不存在”时,听者不会相信这是事实,反而认为说话者是存在的。因此,说话者的践言行为是一种“自我驳斥”的(self-defeating)尝试,导致的是相反的结果,即通过他人确证自己的存在,这就是欣提卡所说的“存在性的自我确证”(existentially self-verifying)。

以上“公共”言语行为(“public” speech-acts)分析中,我对他人说“我不存在”,因而确证了“我在”,但这还不是“我思故我在”中的“我在”,要想确证“我思故我在”,还需要将“我”践行言语的场合转换到思想的领域中,也就是“我”在心灵中对自己说“我不存在”。由于“我”认识自己,因而当“我”在心灵中对自己说“我不存在”时,自己是不会相信的,这反而确证了“我在”的真实性,这一“私人的”思想行为(“private” thought-acts)的实质就是:我思“我不存在”,这是不可能的,因而“我思故我在”成立。

站在逻辑学最前沿的欣提卡认为,在“我思”命题中,正面证明“我思故我在”是不可能的,因为目前还没有一种推理形式可以让我们从“我思”中有效地推论出“我在”来,因而只能通过否定性的方式加以证明。这里,“我在”的不容置疑并不是给定的,而是需要主动地去揭示,而“我思”一词的功能就是主动地去思想“我不存在”,由于这必然导致荒谬,因而从反面证明了“我在”的真实性,“我”的存在性由此自我显现出来。因此,从“我思”到“我在”不是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毋宁说是从过程到结果的关系,类似于从演奏乐器到音乐响起,从打开光源到照亮周边,这些都需要一种动态的人为操作,而不像前人解释的那样,是通过静态的推理而确证“我思”命题的,“故”也因此而具有更多的动态性。总而言之,“我思故我在”是“我”通过践言而确证自身的过程^{[3](12-16)}。

欣提卡诠释的特色在于:首先,他将“我思故我在”的发生过程当成一个思想行为,这个私人的思想行为与相应的公共言语行为是逻辑同构的,而“我说‘我不存在’”这样一个言语行为之所以不可能,不是源自逻辑矛盾,而是这样一个行为不具备现实性,不符合我们的日常语言游戏规则,因此,“我思‘我不存在’”也是不可能的,“我思故我在”由此成立。其次,“我思故我在”无法正面证实,只能通过否定它的反面而肯定它的正面,这与黑格尔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证明“我思”命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4](65-75)}。再次,“我在”是一种潜在,若要变成现实,需要某种动力因,而“我思”

正是这样一种动力因,它通过主动地思想“我不存在”,将“我是否存在”这样一个本被掩盖的问题揭示出来,最终排除掉“我不存在”的可能性,留下“我在”的必然性。

这种融合了语言哲学和辩证法的诠释方法使得欣提卡对“我思”命题有了一种独特的解释力,论文发表之后立即引起巨大反响,其中威斯康辛大学的朱利叶斯·温伯格(Julius R. Weinberg)和凯尼恩学院的詹姆斯·卡尼(James D. Carney)的批评文章进入了欣提卡的视野。1963年,欣提卡发表了论文“我思故我在:既是推理亦是践言”^[5]作为回应,进一步澄清自己的观点,但并没有修改其理论内核。之后30多年间,批评文章不断涌现,但欣提卡仍然坚持认为这些批评文章不得要领,提不出什么更为建设性的意见,因此在这个领域搁笔,做其他的研究。有趣的是,重新让欣提卡回到这个领域的不是逻辑学家和哲学家,而是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Calvino, 1923~1985),他的小说《不存在的骑士》(The Nonexisting Knight)引起了欣提卡的兴趣,引发欣提卡深思1962年论文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下面我们来解读1996年论文。

二、1996年论文:践言性诠释的深化和变向

《不存在的骑士》有一个情景是这样的:中世纪的一天,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阅兵,来到一位骑士面前,这位骑士竟然还带着面罩,显得十分地不恭,查理大帝生气了,质问道:“你为什么不露出脸来见你的国王?”骑士回答:“因为我不存在,长官!”^{[6](5)}

初看这个虚构的故事,似乎它构成了对欣提卡的践言性诠释的反例:骑士竟然能够在公共场合下成功地宣告“我不存在”!不过欣提卡马上补充说,骑士的“不存在”,只是世俗意义上的不拥有身体,但是骑士却能通过说出“我不存在”而引起国王的注意,使国王确信他的存在,因而在一个更为抽象的意义上,骑士是存在的。

进一步设想,一个演员扮演哈姆雷特,当他在舞台上说:“我思故我在”时,这个事件发生在莎士比亚的虚拟世界中,因而,说话者不是演员,而是演员扮演的哈姆雷特,“我思故我在”所确证的也不是哈姆雷特在现实世界中的存在,而仅仅是哈姆雷特在莎士比亚的虚拟世界中存在。这里我们就会有疑问,当说话者是虚拟人物时,“我在”是不是也变成虚拟的“我”的存在?虚拟的存在究竟还算不算存在呢?换句话说,我们是否误用了“存在”这个词?如果这里的“存

在”用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只能追问,这里的“我在”中的“我”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存在体(entity),也就是问:“我是谁?”用欣提卡的话就是:“我思,故谁在?”(cogito, ergo quis est?)

按照欣提卡的看法,在践言性的言语行为中,他人知道“我”是谁,而在践言性的思想行为中,“我”也知道“我”是谁,这是践言性诠释的一个假设,但这个假设并没有深究“我”是如何识别自己的,如果我认不出自己,那么我怎么判定自己存在与否呢?欣提卡承认这是他的1962年论文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我”的同一性问题。

那么,同一性(identity)是如何被识别(identify)的呢?欣提卡区分了两种识别的模式:公共识别模式和视域(perspectival)识别模式(即私人识别模式)。公共模式指通过某个人的姓名,出生地等来识别这个人是谁;视域模式则是通过我们的眼睛对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中出现的人进行识别,按照罗素的术语,前者所识别的是摹状的对象,后者所识别的是亲知的对象,亲知比摹状具有认识论的优先性,我们用“这”、“那”、“现在”、“这里”和“我”等指示词来识别视域的对象^{[6](8-12)}。

按照这种区分,如果我要通过言语行为或者思想行为确证自我的存在,那么,确证者必须在场,成为该践言的目击者(eyewitness)和思想见证者(thought-witness);说话者或者思想者必须是确证者亲知的对象,该言语行为或者思想行为也必须是当下的。在场与当下,这就等于将说话者或思想者限制在一个特定的时空场之中,即目击者或思想见证者的视域之中。在公共言语行为中,“我”确证了说出“我思故我在”的他人的存在;相应地,在私人的思想行为中,我们也需要这样一对范畴。于是欣提卡将自我拆成两个,即作为思想践言者的“他我”(alter ego, 另一个自我)和作为思想见证者的“自我”,在践言的思想行为中,“我”当下在场地见证了“他我”的存在,“他我”是“我”的亲知对象,由第一人称代词“我”指涉,因而是一个在视域中被识别的存在体,“我”与“他我”的同一性据此建立起来。

由此,欣提卡深化了1962年论文中的观点:“我思”的视域性特征限制了它自身,因而“我思”洞见仅仅是一个瞬间性事件,其真理性仅仅于当下在场有效,它“几乎不能推论出任何一个公共对象的存在,更不用说实体(substance)了”。也就是说,“我思故我在”并不能扩展为“思想者存在”这个普遍命题,要得出后者,还需要像笛卡尔那样,证明神的存在,以此保证真理的最终持存,让神“奇迹般地将视域的对象转变为公共的对象”^{[6](12-15)}。欣提卡最后的结论给了我们一个很

大的落差,雄心勃勃要替笛卡尔解决问题的欣提卡怎么又学起笛卡尔搬出上帝了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欣提卡的理论矛盾和困境所造成的。

三、践言性诠释的突破与困境

对于欣提卡的1962年论文,美国著名哲学家,马萨诸塞大学教授弗雷德·费尔德曼(Fred Feldman, 1941~)评论道:“在所有试图阐释‘我思’洞见的现代作品中,没有哪篇论文的影响力和争议性能超过欣提卡的论文。”^{[7](345)}费尔德曼对欣提卡诠释是持否定态度的,其中有一个质疑值得注意,费尔德曼认为,假设欣提卡的方式是对的,通过思想“我不存在”这个句子确实能够确证语句“我在”,但是这个践言行为真的能够蕴含实际的“我在”吗?欣提卡所谓的被确证的“我”究竟是“实际存在的个体”呢,还是“所有可能的个体”(all possible individuals)?^{[7](360)}

这一质疑是有效的吗?在我们没有分清诠释语境之前,这一质疑是有效的,在笛卡尔时代,意义的首要载体是实体,“我”最终将被证明为精神性的实体,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欣提卡确实无法通过言语确证实际中的“我在”。但是正如本文所说,欣提卡是在新语境中诠释“我思”命题的,当哲学经历了语言转向后,哲学所探讨的对象已经变了,语言哲学不再探讨形而上学主体是什么,因为这已经超越了语言的界限^{[8](64-66)}。在维特根斯坦等分析哲学家看来,世界与语言同构,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通过谈及适合的语言谈论世界”^{[9](11)}(伯格曼语^⑧)。从这个角度看,通过思想行为所确证的“我在”本身作为一个语言命题,并没有衍推出实际的“我在”的必要,欣提卡所要探讨的,仅仅是作为语言命题的“我思故我在”的合理性,用蒯因的术语,“我”是否存在并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只是一个承诺问题。

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何欣提卡坚持认为,“不存在的骑士”是存在的,而说出“我思故我在”的哈姆雷特也是存在的,因为这里的“存在”一词符合当前的语境,也就是符合日常语言的用法,而不是因为这里的“存在”表示现实中的存在。欣提卡将“我思”命题的现实性排除在外,看似缩小了“我思”命题的问题域,实质上却从另一方面扩大了“我思”命题的应用范围——即可能世界之中,这是对“我思”问题域的转换,是一种突破。

既然“我思”命题的合理性源自其日常语言的逻辑,那么作为一个语言命题,“我”又是如何通过践言

方式确证“我”在语境中现身的呢?欣提卡诠释最为革命性的部分,就是不再像笛卡尔那样从自我出发,而是通过他人的眼光确证自身,“我”的存在与否依靠的是他人的判断,而他人对“我”的言语的判断又依赖于公共的语言游戏规则,这样,“我”就只是相对于“他人”而存在的一个代词。如果按照这种思路看,那么在公共言语行为中,“我”是践言者,他人是确证者,“我”通过他人确证自己的存在;在相应的思想行为中,作为内化了的语言规则的“他我”确证了“自我”的存在,这就赋予了他人认识论上的优先性。如果我们不采用列维纳斯的视角,将他人当作一个绝对的谜的话,那么当我们继续追问,他人又是怎么被识别时,我们又要提到“自我”,这是一个循环论证;如果我们将他人在认识论上的优先性当成一个立足点,那么我们又悄悄地将笛卡尔的“我思”解构了,这已经是在用一种“后维特根斯坦”的“较为注重个人间的和共同体的姿态”取代了“笛卡尔哲学的个体主义的和自我中心的态度”^[10](133)]。

这一个理论困境,欣提卡是心知肚明的,在笛卡尔立场和维特根斯坦立场之间,他找到了调停人罗素,试图将1962年的思路调转一番,也就是在践言现场中,不是他人确证了“我”的存在,而是“我”在视域中确证了说出“我思故我在”的他人的存在,由于“我”能够确证他人的存在,因而他人也能够确证“我”的存在。如果要使这一推论成立,我们又需要引入“同理心”(empathy,“移情”)的机制,而欣提卡没有这么做。类比到践言的思想行为中,“我思故我在”的确证过程也同样经历了从“自我”到“他我”再到“自我”的过程,在“他我”确证“自我”之前,“他我”需要在场,即在“自我”的视域中,是“自我”亲知的对象,也就是说,这里的“他我”已经不再是1962年论文中的内化了的语言规则,“他我”已经超越了语言而变成了“自我”的实指对象,我们已经说不清“他我”究竟是什么了,它与“自我”是无差别同一的,设置“他我”实属多余,这样,“我思故我在”的确证过程就变成了从“自我”到“自我”的实指过程,这与唯我论其实也相差不远,因而,欣提卡不得不学笛卡尔,搬出上帝,这一看似画蛇添足的补充,正反映了欣提卡诠释的困境所在。

正如上文所说,欣提卡诠释最为革命性的部分,乃是“我”通过他人的眼光确证自身,由于面临着“我”与他在认识论上的优先性问题,即视域识别模式和公共识别模式的优先性问题,欣提卡不得不做出某种让步,从新语境中回到了原语境,这样,欣提卡诠释的革命性也就消失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在笔

者看来,欣提卡1962年论文开辟的“我思”诠释新路线是让人兴奋的,他在分析哲学语境中替笛卡尔辩护的同时也解构了笛卡尔,因为分析哲学本身的一些假设与笛卡尔哲学的假设是矛盾的,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待语言的问题上,对于笛卡尔来说,日常语言并不是表达真理的最佳途径,正如他曾经感叹道:“即使我不言不语地在我自己心里考虑这一切,可是言语却限制了我,我几乎让普通言语的词句引入错误。”^[11](31)]而对于欣提卡而言,日常语言游戏规则是能够表达“我思”真理的。由此围绕着语言问题,笛卡尔和欣提卡在“自我”和“他人”认识论上的优先性问题,“我思”命题对应的是现实世界还是语言世界等问题上都有分歧,因而,欣提卡的辩护最终面临着困境,但如果我们将欣提卡的诠释看成一种“接着讲”的再诠释,那么我们仍旧可以继续欣提卡的事业,继续探索“我思”命题在可能世界中的价值,正如哈姆雷特的存在问题是很多评论者最为感兴趣的话题一样。

欣提卡从一开始就在做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受到了两面的夹击,一面是原语境诠释者的无法理解和批评,一面是新语境诠释者如阿佩尔、哈贝马斯要违他之意将践言性诠释扩展到其他的领域^[3](70)],而对于欣提卡而言这仅仅只是一场解题游戏而已。前者认为欣提卡过于激进,后者则认为欣提卡过于保守。在这方面,欣提卡力求与笛卡尔达成“视域融合”,但是这种融合却并不那么顺畅。欣提卡就像一个医生,想给病危的笛卡尔输入血液,却没有想到不同的血型之间存在着对抗,最终欣提卡不得不放弃输血的计划。不过我们仍要佩服欣提卡的壮举,因为他使得“我思”命题在被提出300年后继续在哲学界中独领风骚,让我们忽然惊叹,“我思故我在”竟然有这么大的魅力。

注释:

① 欣提卡:芬兰哲学家,逻辑学家,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教授,他的哲学自成一家,在数理逻辑、哲学逻辑、数学哲学、认识论、语言理论和科学哲学等领域都有突出的贡献,他著述浩繁,撰写和编辑著作30余部(包括合著),发表论文300余篇,主编《综合》(Synthese)杂志凡40载。在国内,Hintikka还有另外多种译法,如辛提卡、欣蒂卡、亨迪卡、辛梯卡。

② 践言:performance,在本文中欣提卡用这个词来指涉通过说出“我不存在”而确证“我在”的言语行为,以及通过思想“我不存在”而确证“我在”的思想行为,因此,performance不仅有“践言”之意,还有“践思”、“践行”之意,为了统一译名,通称“践言”。至于翻译成“践言”的理由,参见参考文献[2]。

- ③ 伯格曼(Gustav Bergmann): 维也纳学派的成员, 分析哲学早期的代表人物之一。

参考文献:

- [1] Peter Markie. The Cogito and its importance[C]//John Cottingha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escar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2] 韩东晖. 践言冲突方法与哲学范式的重新奠基[J]. 中国社会科学, 2007, (3): 67-76.
- [3] Jaakko Hintikka. Cogito, Ergo Sum as an Inference and a Performance[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62, 71(1): 3-32.
- [4]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 [5] Jaakko Hintikka. Cogito, Ergo Sum as an Inference and a Performance[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63, 72(4): 487-496.
- [6] Jaakko Hintikka. Cogito, Ergo Quis Est?[J].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1996, 50(195): 5-21.
- [7] Fred Feldman. On the Performato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gito[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73, 82(3): 345-363.
- [8] 李红, 韩东晖. 究竟什么是“不可说”的——对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扩展性解读[J]. 哲学研究, 2005, (8): 64-68.
- [9] 张庆熊, 周林东, 徐英瑾. 二十世纪英美哲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 [10] 科廷汉姆. 哲学及其历史[C]//欧阳康. 当代英美哲学地图.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 [11] 笛卡尔.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Cogito, ergo sum” in the context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breakthrough and dilemma of Hintikka’s interpretation

LI Xi

(College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Jaakko Hintikka created a new paradigm in the domain of interpretation on the “Cogito, ergo sum” proposition, namely the Performatory Interpretation. According to this interpretation, cogito was explained as a thought-act, which had the same logical structure with the speech-act. The most revolutionary point of view of Hintikka was that “I” (or “ego”) were self-verified through others in the ordinary language game, which had been revised to a certain extent later, but the fundamental point of view had led to a number of views contrary to Descartes. Thus, Hintikka had opened a new path for the paradigm.

Key words: Descartes; Jaakko Hintikka; Cogito; ergosum; the performatory interpretation

[编辑: 颜关明]